

全国政协委员谈企业家精神：

保护企业家就是保护市场的灵魂

■ 本报记者 张凡

聚焦全国两会

创业半个多世纪,他从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前不久,著名企业家鲁冠球去世后,企业家们纷纷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不仅是对他致敬,也是向企业家精神致敬,更是向产生企业家精神的时代致敬。鲁冠球的故事如同一部电影,回放着改革开放40年的激荡历史。

令人兴奋的是,更利于企业家的时代即将到来。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到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再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企业家精神”,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全国政协委员们就此展开了讨论并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唐长英的建议是设立“企业家日”,主要是从以下四方面开展

工作:一是选定某个特定日子为每年的“企业家日”;二是确定每年企业家日的主题活动;三是广泛宣传企业家群体形象;四是积极引导企业家树立崇高理想信念。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需要通过弘扬企业家精神去引领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让更多的优秀企业家涌现出来,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唐长英说。

当然,企业家精神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良好的环境去激发,尤其是良好的法治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土壤,也是发挥企业家作用的保障。杜绝侮辱杀人案中的苏银霞、《人民的名义》中的蔡成功、亚布力怒吼的毛振华的再一次出现。企业家所创造的价值和作用需要保护、认可和尊重,才能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政协委

员、贵州省总商会副会长、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山呼吁保护企业家就是保护市场的灵魂,显得多么及时和必要。他说:纵然是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政策法规,如果没有在基础层面的严格依法办事等其他配套措施加强对企业家的平等保护,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根基不牢,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受到影响。

为此,朱山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建议:一是要像保护科学家一样保护企业家。企业家和科学家都有创新创业的精神,然而,创新创业只有在良好的法治环境、竞争环境和稳定预期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二是要重点加强基层法治政府的建设力度,夯实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微观基础。这主要从提升基层政府部门依法办事能力、完善法制机构和职能、加强专业人员引进和培养、明确党政一把手的法治建设责任等方面着手。三是要强化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对企业家的平等保护,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四是建立完善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机制。五是各级政协应定期开展产权保护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监督视察工作。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工商联主席李武章引用这句古诗来回答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他说,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一池活水,水质变好了,变干净了,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才能更有效地被激发,创业创新的意愿才会更加强烈,民营经济这条“大鱼”才能生长得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像这样的发言、建议在两会期间还有很多。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政协委员们纷纷针对企业家精神建言献策的源动力来自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主导转向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驱动,实现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的转换。《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文钊在文章中将这样的转变形容为“史诗般的一跃”。他在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这样的一跃需要强有力的支撑。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支点就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拥有这个支点,我们需要企业家茁壮成长的环境,需要企业家精神尽情释放的空间。



破除隐性壁垒 优化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江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有一肚子苦水。他说,过去10年,“新官不理旧账”的事情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很多次。

在政协工商联小组讨论时,刘强东举例说,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曾经与他们有道路拓宽合作计划的某地换了新区长,之前签订合同承诺的道路拓宽计划作废了,说如果要执行原合同就让他们找前任。

全国政协委员、月亮集团董事长席丁佐宏对此很有共鸣: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出后,有的地方官员虽然“清”,但不干事了,我们对营商环境的信心一度遭到打击。

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除了基础设施的可得性外,它更强调企业开办、运营、关闭和市场维护全流程的便利化。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从地区来看,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有两个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分别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全球前十大改善最多的经济体中也有两个在该地区,分别为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但是中国却不尽如人意,排名第78位。

以企业设立为例。上述报告显示,现在开办企业的全球平均耗时为21天,而10年前这一数字是46天。简化开办企业的条件是迄今为止改革最多的领域,企业设立过程的便利化是目前全球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在中国,从自贸区开始推进的企业登记制度改革历时4年多,多数措施已推广至其他自贸试验区直至全国。可以说,在企业设立的改革创新上,如果仅以工商登记环节来看,中国的得分应当接近于国际评估中靠前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从登记到实际营业,还需多个环节,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需核准事项的环节,都被纳入到国际营商环境指标中。我国在这些方面还远未改革到位。

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有很

多改革举措,但要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仍需在涉及审批权的环节上提高确定性和透明度。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在小组发言中说,应分行业全面摸底审批环节,初步统计平均成本、数量、时间和涉及部门,归并、整合或取消部分审批事项,对企业反映较大的问题进行跨部门研究、会诊和解决,全面优化审批流程的时控、信息公开,拓宽企业参与、知悉、投诉和反馈渠道。

在胡卫看来,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是与外部竞争,但重点在于国内改革。目前,改革重点都在机构简化或机构联合办公,来解决放开后可能出现的事中事后监管问题。而国际高标准往往要求提高保护标准、维护公平秩序、严格透明执法,重在“整平竞争场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要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具体措施包括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幅缩短商标注册周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再压减一半,决不允许执法者吃拿卡要;清理群众和企业办事的各类证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坚决破除各种隐性壁垒等。

在投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隐性壁垒”,包括“玻璃门”“弹簧门”等。丁佐宏认为,事实上,破除隐性壁垒就是解放生产力。

对于如何破除隐性壁垒,丁佐宏建议设立机制,监督那些存在隐性壁垒、懒政怠政的部门。

在民营企业眼中,地方政府的作为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地方政府是否讲诚信、重承诺对企业投资和发展信心有很大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富通集团董事长席丁建沂呼吁,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应该让政企沟通更顺畅一些,让法治意识更强烈一些,让契约精神更多一些,让“干事、担当、奋斗”的氛围更浓厚一些。

出海记

9家中企去年在纽交所上市

本报讯 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管近日透露,2017年在纽交所上市的非美国公司共有35家,其中9家来自中国,数量在所有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中最多。

纽交所国际资本市场总监亚历克斯·易卜拉欣表示,迄今已有87家中国企业在纽交所上市,类型包括大型国企、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总市值超万亿美元。他认为,2018年,中国企业在纽交所上市的强劲势头有望持续。

易卜拉欣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上市,在纽交所挂牌的非美国公司数量已超500家。2018年1月,就有5家非美国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他表示,除中国外,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欧洲也是上市新公司重要海外来源地。

纽交所上市服务部副总裁克里斯·泰勒告诉媒体,去年共有89家公司在纽交所上市,融资总额达310亿美元。根据泰勒提供的数据,纽交所现有45个国家23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5万亿美元。(徐兴堂 张默成)



国际咨询机构毕马威(KPMG)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接受其调查的中资企业已有30%在德国当地开展研发活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此刊文指出,中国企业在德设立研发中心势头强劲、成效显著,已成为中德合作新亮点。(彭大伟)

浪漫的热气球、神秘的宗教、灿烂的文化遗产,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交汇点,因独特的地理优势,曾在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古丝绸之路始于中国,终于土耳其,因古丝绸之路而结缘的中土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近几年,土耳其的兴趣和关注日益高涨。有不少中国企业也开始赴土耳其投资。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土耳其的分水岭。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土耳其的兴趣和关注日益高涨。在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举办的土耳其投资环境与经商法律政策指南专题讲座上,土耳其投资支持促进局局长阿尔达·埃尔穆特表示,鉴于土耳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及发展前景,中国企业投资土耳其,不仅能在土耳其当地市场得到回报,还可以土耳其为支点,辐射中东、北非、欧洲、中亚以及俄罗斯市场,进而全面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据了解,土耳其政府提出的2023百年愿景,即土耳其在2023年要达到的目标,涉及医疗保健、经济、国防、教育等领域。过去10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速度接近5%,已成为全球第18大经济体、中东第一大经济体,迅猛的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前景,使得土耳其成为继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后又一不折不扣的新兴经济体。此外,土耳其的区位优势也日渐凸显。土耳其处于亚洲、欧洲两大洲的交界处,港口、机场、公路、铁路、油气管线等基础设施完善,已成为区域至关重要的产品、服务、人员、

技术集散地。利用土耳其战略性地理位置,投资者将得以进入周边拥有15亿人口、综合GDP达到25万亿美元、国际贸易额达到8万亿美元的潜在市场。

土耳其本地市场正日趋扩大,当地人口总数超过7800万,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民众消费能力很强,消费观念超前。同时,土耳其一半人口年龄低于31岁,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力素质较好,能为中国企业赴土耳其投资增添许多活力。土耳其共和国总理府投资支持促进项目总监艾哈迈德·萨米地介绍。

土耳其涉及投资管理的部门及法律众多,相关规定在《商法典》《外商直接投资法》《对外贸易法》《海关法》《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预防法》《自由经济区法》《政府促进进出口

投资土耳其 回报或超预期

■ 本报记者 钱颜

收措施法》和《外资框架法令》等文件中都有体现。相关专家建议,中国企业对土耳其投资时一定要充分了解土耳其投资相关法律及政策,咨询当地律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员。

在土耳其创办企业,主要适用土耳其的《外商直接投资法》。该法基于平等对待的原则,赋予国际投资者和本地投资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设立企业和股权转让的条件与适用于本地投资者的条件相同。外国投资者可建立土耳其商业法(TCC)规定的任何形式的公司,土耳其商业法提供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公司治理方式,促进私募基金和公募活动,提高管理运营的透明度,并将土耳其的商业环境与欧盟立法以及加入欧盟的进程保持一致。艾哈迈德·萨米地指出。

艾哈迈德·萨米地还表示,为了吸引外资,土耳其政府全面执行低税收和激励措施,企业所得税从33%减少到20%。技术开发区、工业区和免税区则可享受全部或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对社会保障中雇主应承担的部分提供补助以及土地配给等。针对战略投资、大规模投资以及地区性投资,土耳其也有相应鼓励研发和创新的法规在推行中。

土耳其政府非常欢迎外资在当地投资,科技、通信、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承包工程,都是土耳其市场中回报率、商业风险相对较低的领域。华为就是中企来土耳其投资的成功企业之一。早在2002年,华为就开始在土耳其开展业务,并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设有办事处。到目前为止,华为(土耳其)共有1500名员工,其中85%以上是土耳其人。艾哈迈德·萨米地说。

吸引外资,土耳其政府全面执行低税收和激励措施,企业所得税从33%减少到20%。技术开发区、工业区和免税区则可享受全部或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对社会保障中雇主应承担的部分提供补助以及土地配给等。针对战略投资、大规模投资以及地区性投资,土耳其也有相应鼓励研发和创新的法规在推行中。

土耳其政府非常欢迎外资在当地投资,科技、通信、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承包工程,都是土耳其市场中回报率、商业风险相对较低的领域。华为就是中企来土耳其投资的成功企业之一。早在2002年,华为就开始在土耳其开展业务,并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设有办事处。到目前为止,华为(土耳其)共有1500名员工,其中85%以上是土耳其人。艾哈迈德·萨米地说。

海尔管理案例第三次进入哈佛课堂

本报讯 日前,海尔集团经营管理的案例《海尔:一家孵化创客的中国企业巨头》成为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材案例,这也是海尔的案例第三次进入哈佛课堂。

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模式是互联网与物联网时代下的成功探索,在企业管理模式上,中国企业已经从模仿者成为引领者,至少是引领探索者,中国有很多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相信未来会得到国际学界和商界更多关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表示。

张瑞敏说:海尔的管理模式植根于中国社会与海尔的企业文化,体现了系统思维理念。他表示,“人单合一”是多方共赢的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第一,给所有人都创造机会,最终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共赢。

2005年,海尔首次提出“人单合一”模式,经过长时间探索,形成了整套管理体系,取得很大成功。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莎贝·坎特认为,虽然“人单合一”模式仍然在探索当中,不过实践证明该模式是成功的,海尔的变革是没有先例的。

据悉,海尔集团此前分别于1998年和2015年两次入选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材。张瑞敏说,在企业管理模式上,我们从没有商业模式到创造商业模式,走在实践的前列,中国企业真正走近了世界舞台中心,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中国企业管理的案例进入哈佛课堂。(张朋辉)

内忧外患 倒逼轮胎企业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青岛双星3月上旬与以韩国产业银行为首的锦湖轮胎债权团达成一致,青岛双星将以增资方式持有锦湖轮胎45%的股权,并成为其控股股东。双星集团表示,交割完成后,双星将发挥锦湖轮胎的优势和双品牌协同效应,尽快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化企业。这项增资大约折合40亿元人民币,预期第三季度完成交割。

近几年,中国轮胎企业正在积极走出去,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特别是在亚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内轮胎企业基本把东南亚作为投资设厂的首选,这是因为当地具有优质天然橡胶资源、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优越的投资环境。2017年,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签署备忘录,准备在马六

甲州投资建设轮胎厂,计划占地面积90亩,主要生产高档轮胎,同年5月,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越南广南省龙江工业园投资16.7亿元建设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胎的轮胎厂。

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内竞争压力大。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专家也表示,随着中国环保督察力度加大,国内优惠政策大幅削减,再加上人力、税负等,轮胎企业的生产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环保税1月1日正式实施,在影响轮胎行业的同时,其他相关产业如电厂、煤化工厂等也开始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导致上游原料货源紧缺,拖累开工。

但中国轮胎企业海外扩张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中宇资讯资深原材料分析师李旭表示,轮胎出口是中國轮胎企业主要盈利手段之一,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40%至50%,但频繁的反倾销调查将严重影响以轮胎出口为主要盈利手段的中小轮胎企业。

其中,中国轮胎最常受到的是欧美等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前几年尤其受美国“双反”影响最大。白明介绍,以2017年为例,欧盟、土耳其、秘鲁纷纷宣布对中国橡胶轮胎采取反倾销调查,欧盟也在2017年10月表示对华卡车轮胎启动反补贴调查。

美国和欧盟轮胎的准入标准也在不断调高。在出口轮胎过程中,最令中国轮胎企业头痛的就是认定标准。轮胎业人士表示,达到这些

国家的标准就意味着企业要多付出两项成本,即提高生产成本和新增巨额检测费用。

面对压力,李旭认为,中国轮胎行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做大做强品牌效应,并采用智能化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研发新轮胎产品。有业内人士也认为,频繁遭遇国际“双反”调查的现象警示中国企业应加速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和绿色轮胎产业化要结合起来。白明说,智能制造在解决人工成本、产品同质化和提高效率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李旭表示,发展智能制造已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轮胎企业是否走智能化之路,关系着其长远发展。研发绿色轮胎同样也是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海外建厂进而在进口国建厂无疑降低压力的明智选择。白明表示,中国轮胎企业不进则退,必须要整合全球的资源,扩大生产,到海外建厂,能够更好地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对轮胎出口的影响,还能成为后期拓展海外市场做铺垫。

中国轮胎企业海外发展益处很多。白明强调,就地生产可以提高便利度,更加直接地获得海外的优质资源,从而在国际轮胎市场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

白明同时强调,中国轮胎行业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一些企业还未达到海外生产的规模,应先在国内发展。而已经走出去的企业也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等,令海外发展更顺畅。